

蒲亨强 著

神圣礼乐

——
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

儒道释
博士论文丛书



巴蜀书社

蒲亨强 著

神圣礼乐

——
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圣礼乐——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蒲亨强编. —成都:巴蜀书社,2000.8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ISBN 7-80659-093-5

I. 神... II. 蒲... III. 道教-宗教音乐-研究
IV. J6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578 号

责任编辑:周田青

封面设计:张光明

神圣礼乐

——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

蒲亨强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厂印刷

成都机场路月亮湾体育中心侧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0 千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0659-093-5/B·17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

主 编：汤伟侠(执行) 卿希泰(执行) 杨继瑞

副主编：唐大潮 李 刚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龙汉基	汤伟侠	余孝恒	杨宗义
杨继瑞	吴景星	李 刚	陈 兵
罗中枢	赵镇东	姜 生	卿希泰
唐大潮	翁永汉	黄小石	梁赞荣
潘显一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由香港圆玄学院资助出版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缘起

儒道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感情和强大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几千年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无数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并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采。

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对儒道释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博士点，使年轻的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轨道，一批又一批的博士毕业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一支强大的新生力量，是有关各学科未来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部分在出版之后，已在国内外的同行学者中受到了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学术著作的出版甚难，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因此还有相当多的博士学位论文难以及时发表。不及时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

不利，且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学术交流也不利。我们有志于解决此一难题久矣，始终均以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近与香港圆玄学院商议，喜得该院慨然允诺捐资赞助出版《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这将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产生它的深远影响。

本丛书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征稿。凡是以研究儒、道、释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皆属本丛书的出版范围，均可向本丛书的编委会提出出版申请。

本丛书的编委会是由各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审定申请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入选工作。我们掌握的入选条件是：（1）对有关学科带前沿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重大突破、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向前发展的；（3）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的。凡具备其中的任何一条，均可入选。但我们对入选论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这就是文章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须有科学的依据，应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并详细注明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避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我们提出这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其目的乃是期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工作，在年轻学者中倡导一种实事求是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谨学风。

由于编委会学识水平有限和经验与人力的不足，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全国各有关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加强联系和合作，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的书稿，让我们一道为搞好《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的出版工作、为繁荣祖国的

学术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

1999年8月5日

序

道教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是起步较晚的一支，大约十年前，以上海、湖北武当山等地为前导，全国各地相继开始了抢救式的收集整理工作。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和研究成果的迭相问世，道教音乐渐成为学术界注目的一个热点，她的特殊艺术魅力和价值，她在中国音乐和道教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开始显露出来。虽然十年来道教音乐研究成绩不小，但毕竟因道乐研究者多系半路出家，宗教知识储备不多，研究时间较短，因而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研究对象的精密，历史发展线索和规律的清理，审美风格的确认及文化背景寻根等，都需要提上研究日程，使道教音乐的研究能深入进行，提高到新的水平。

亨强同志在硕士期间是攻读中国民歌，临近毕业时参加了湖北武当山道教音乐的采集调查和研究工作，以后一直专攻道教音乐研究，十年来作了诸多专题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他仍不满足现有状况，追求新的提高，在刚过不惑之年，毅然抛弃较优越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继续深造，深入进行道教音乐的课题研究。

亨强同志博士论文选题为《神圣礼乐——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从标题上可以看出，他特别注意严格限定特定的研究对象，以聚焦于宗教神圣性、礼仪性、延续性最突出的道士集团，我以为，这在当前道教音乐研究中是很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因为道教音乐一如道教，是一个杂而多端的体系。大而言之，有道派的不同，自古有上层官方正统道教和下层民间道教之分，同一道派的音乐，又有专用于仪式和用于闲暇自娱之分，虽然一般都可列为道教音乐，但其间的差异是很大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以往研究者由于不注意研究对象的精密区分，对同一地区道教音乐的风格各说各话，或说明快活泼，或说幽雅玄妙，结论竟全然不同，说者本有道理，听者一片混沌，不知就里。问题就出在论者都没有注意和强调道派的差异。这种现象并非个别，长此以往，就无法找准道教音乐的内核部分，逼近道教音乐的本质内容。

论文作者在入校前已有多年道教音乐研究的基础，经常出席国内外有关道教音乐文化的学术会议，对道教音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全面清楚的了解，因而他在博士论文中力求有新的突破，主要针对当前研究现状中存在的某些薄弱环节而作深入研究。

一方面，针对以往重微观局部，略宏观整体的思路，从历史、艺术形态与文化背景三要素入手，将宏观研究与微观透视结合起来，以求系统立体地把握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的整体概貌，以往研究中很少采用这样的思路和结构，以至至今不知道教音乐的整体面貌为何，这显然不利于道教音乐的继承宏扬。

另一方面，作者的论述力求直接切入最能反映道教音乐不同于其它民族音乐品种的内容，注重道教音乐的宗教性质，将体现

道教信仰哲理的音乐与那些虽有道教思想色彩而已世俗化的音乐区别开来，将艺术学研究与宗教学研究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揭示道乐的特殊本质，使人们真正认识道乐的艺术品格、价值、功能和意义。又进一步将审美风格和文化生态的研究结合起来，深究道教音乐独特风格的形成机制，使人们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由此出发，作者在论文的资料、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作了诸多新的开拓，使论文具有了较高的理论学术价值和创造性，获得以下一些比较突出的进展。

其一，关于道乐历史学的研究。作者首先在资料发掘上下了功夫，虽然作者在读博前已通过广泛实地调查积累了大量文献和音响资料，但仍力图有新的开掘和发现，他用了一学期多时间集中系统地查阅了《道藏》、《藏外道书》等道教文献中有关科仪音乐的记载，开掘出大量在音乐学术界尚未得见的新资料，因而得以在论文中提出不少新论。例如关于正统科仪音乐正式形成时期及创立人的问题，以往学界多认为是北朝天师道领袖寇谦之，而他却依据大量原始科仪文献中有关道派、人物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记载，以典型仪式为标本，并结合仪式音乐的形态风格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因素作了综合分析，纠正了前人的看法，提出南朝灵宝派领袖陆修静是科仪音乐创立者的新观点。又如在揭示科仪音乐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规律时，他不是停留于空疏的论述，零散片断的描述，而是力图作系统连续的和详实的考证分析，通过大量具体仪式实例——大到完整的全套仪式程序，小到每个仪式构件（礼仪节目和音乐曲目）——的跟踪考索，从魏晋南北朝而唐宋元明清而现当代，逐代逐一作了细致研究，由此首次梳理出道教科仪音乐发展史的完整线索，对当代道教仪式音乐的基本面

貌和历史来源获得较完整而具体的整体性把握，并证明道教科仪音乐确是保存古乐资料最多最完好的一个音乐品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二，在音乐艺术形态学研究方面，提出道教科仪音乐框架“起、承、合”的三部性结构；又通过对具有典型性的武当山与北京白云观科仪音乐的比较分析，指出道乐腔调的通用性特点；对当代道乐基本构件历史来源的归纳，对重南方风格的超地域文化属性的确认，以及将昆曲中的“主腔”概念移植于道乐而作为结构的理论依据等，都不失为具有个人独创性的见解。

其三，在音乐审美风格学研究方面，首先指出道乐宗教性的本质特点，道乐自身特点的形成与道教迥异于常人的音乐观念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道教音乐观受神学信仰的制约，无论其本体观、功能观和审美观都贯穿着神秘玄虚的线索，并对道教的音乐心理和音乐实践有直接影响。由此导致道教音乐独特审美风格的形成。作者又依据音乐审美形态、历史文化学和道教养生学的多重分析，首次论证和确认道乐的主导审美风格是偏重南方音乐色彩的阴柔美。其四，在音乐文化学研究方面，多角度探寻道乐风格形成的文化基础，认为其主要蕴茵形成于贵柔主雌的道家道教哲学美学思想、尚巫重柔的南方地域文化艺术传统和宗法虚静的修道养生心理等三种基本文化因素的合力作用。

以上是论文中比较突出的研究进展，通过这些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作者将道教音乐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全文内容较全面，视野开阔，思考较深入。善于运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对道教音乐从多方面展开研究和论证，所得认识和结论比较准确和令人信服，其中提出了不少在今后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相比之下，作者在历史、审美风格和文化背景研究上着力较多，而在音乐形态学研究上则略显薄弱，其中，长吟短吟、齐言与杂言、和声联章以及主腔分析等，都有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处。

总的看来，论文具有求实创新的学风，逻辑性强，思路清晰，文从字顺，反映出作者学术研究的功底较深，创新意识较强。论文在资料运用、研究的观念方法和所得结论上都有重要价值，相信对于今后道教音乐研究会有较多启发和推动作用，对于道教学术研究也有一定参考作用。

欣闻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与香港园玄学院联合出版儒释道博士文丛，深感这是有助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功德无量的事。亨强同志博士论文能参与此举，相信将会为这套文丛增添色彩，因而乐以为序，以襄盛举。

袁静芳

1999, 10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序 论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民族宗教，在华夏文化史上长期与儒、释鼎足而立，盛传不衰，既各有教旨，自成一统，又交叉授粉、相互融摄，共同创造出灿烂夺目的中国传统文化。道教文化既具备一般宗教的特点，又具有许多本民族特点，它综合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民俗伦理和文学艺术等多种元素，在度世救人、长生成仙进而体道合真的总目标下神仙化、方术化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宗教文化体系，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态和思想的吸收和辐射影响都至为深刻广泛，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至被鲁迅先生视为中国文化的“根柢”。直到今天，道教在中国仍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拥有众多的宫观和信徒，信仰和研究道教思想文化的人在全国更是成千上万。道教在国外的崇奉者也在不断增多，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素为不带偏见的西方学者们所景仰赞叹。西方现代工业化所造成的人、社会和自然的异化现象（如战争、生态能源危机、人性压抑、精神紧张而空虚等现代社会病），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和认识道教思想文化的合理性和现代价值。研究道教文化的外国学者遍及美、日、英、法、西德、瑞士、荷兰

等国，在美国、日本、法国还设有规模颇大的专门研究机构，进行专题研究，推出大量成果。由美国、日本等国发起，先后于1968年、1972年、1979年在意大利的佩鲁贾、日本长野、瑞士苏黎士举行了三次国际性道教研究会议，使道教文化进入了国际论坛。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引起国际同行的注重和好评。以上道教学研究多集中在哲学思想、教理经典、历史、民俗伦理等方面，只有极少数学者在科仪音乐领域进行调查研究。

在道教文化体系中，音乐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创始不久，就视音乐为通神达圣的捷径，长生成仙的梯航，弘扬道要的工具，道士大都会吟唱经韵音乐，主持科仪的法师更是精通音乐的专门家。在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道教创造发展了内容丰厚、风格独特的宗教科仪音乐体系，以独有的艺术形式和手法表现神学信仰和宗教情感，成为了解道教文化奥秘的一个特殊窗口。

道教音乐又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成长过程中一路广揽博收中国民族音乐养料，并按神学信仰和宗教审美观对之作了新的综合融化，由此铸造了闪烁着独特艺术光辉的自身品貌，在中国乐坛独树一帜，深受历代人民的赞赏和喜爱，对中国传统音乐体裁形式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中国民族音乐诸多品类中仍在在可见道教音乐的痕迹，足以证明道教音乐在现代社会仍葆有它独特的价值，对于人们审美力的拓展和艺术趣味的多方面需要，以至人体科学的发展，都在继续发挥特殊作用。现仍存活于深山幽殿的道教音乐，仍保留了大量古老传统的形式内容，珍藏着重要的历

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我们相信随着道教音乐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必将拓宽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为诸多传统课题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材料和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道教音乐，我们对道教文化和中国传统音乐的认识将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在道教学研究中有声科仪音乐的研究却起步最晚，至今还没有比较系统真切地把握它的面貌和本质，这种状况与道教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很不相称，也不利于完整把握中国传统音乐和道教文化的总体特点。音乐学界理应在这个薄弱的学术领域奋起直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道乐研究现状及基本特点

道教音乐的调查研究工作初萌于本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主要者如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研究中有专章论及道乐，音乐界在局部地区（湖南、苏州）开展收集研究工作，在道乐研究史上具有拓荒意义。“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中断十多年。七十年代中后期，局部地区如上海、湖北等开始了零星的调研活动。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在全国展开这一历史契机，“抢救”现存道教音乐的工作在全国范围铺开，八十年中期开始，道乐研究趋于活跃，成果逐年增多，论文复盖国内各级音乐和宗教刊物，先后出版了多种道乐曲辑、专著和编著，并多次举行全国性的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武汉音乐学院还成立了“道教音乐研究室”展开积极活动，这些标志着道乐研究进入了“持续发展时期”。

综观近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以地方性道乐的概述最多，多为描述分析当地道乐的特点及其与当地民间音乐的联系，也有论文注意到道派的区别和全真正韵的通用特点，突破了“地方性”的教条，接触到道乐的某些本质特点。道乐与其它乐种关系的探讨，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有关论著广泛涉及到宫庭音乐、佛乐、巫乐、戏曲音乐、民歌、说唱等乐种的比较，有助于多角度地认识道乐自身构成情况和它的历史地位。一般都偏重于民间音乐的影响一面，也有的持双向交流观点。音乐形态学的研究多是综论性质，涉及到曲式结构、音调、宫调、节奏、衬腔、唱法等论域，但对于道乐具有区别性的自身特点还无系统归纳，尚未开始探讨其成因和美学特点。历史学研究较薄弱，且多为研究道乐在外部的流传史，有个别文章是专论道教内部仪式音乐的断代史，尚无有关科仪音乐的通史性论著。文化背景的研究最为薄弱，有少量论文从仪式、五行说、传承方式角度进行探讨，在方法论上有一定启发意义。总的看来，十年来起步甚晚的道乐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研究心得，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初步揭示了道乐在艺术性和学术性上的特殊价值及在中国音乐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为传统音乐和宗教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研究队伍，为道教音乐的学科建设作了人员上的准备。

由于种种原因，如时间和经验的不足，研究者多人自为战，大多尚无较充分的宗教文化知识准备等，目前道教音乐研究按学科建设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存在不少值得深思和亟待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

1. 研究对象的界定。任何学科建设，首先需要明确其研究

对象和基本概念，以保证在规范的术语场中进行有效的讨论。但学术界于此尚无统一明确的定义和共识，具体研究中常人人殊，各有所指，概念的模糊，往往造成逻辑的混乱，延滞了研究的进程。实际上，由于道派和运用场合的不同，道教音乐的内涵差异甚大，必须花力气进行区别，识其内核与表层的界限差异，以使研究的对象与内容更加吻合、精密。因而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应是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

2. 偏重于局部、微观现象的描述，甚少从总体、宏观的视野作综合性的理论分析，至今对于道乐的系统构成和总体面貌尚无完整的把握。没有总体的审视，就难以判断一般与个别、必然与偶然的界线，更无法以高度简约的思维方式把握道乐独有的本质和美学风格。

3. 史学研究十分薄弱，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研究对象不统一，对科仪音乐与非科仪音乐，道内运用的和道外社会运用的音乐无严格区分，往往更偏重于道乐在社会上的流传史；二是基本史料发掘利用的方向有所偏失，多杂取道外文献的零散断续记载，或将道内资料与道外资料不作区分地使用。由此展开的研究完全体现不出一个统一的对象和清晰连贯的历史承递脉络，更谈不上规律的发现。实际上浩如烟海的《道藏》、《藏外道书》等道经中忠实记载了宏富的科仪音乐原始资料，本应是最基本的道乐史料，然而由于思路的偏失，至今尚无较系统深入的整理，并用于研究中。历史线索不清晰，就难以深刻理解当代道教音乐的来龙去脉和现状特点。

4. 音乐形态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也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多持现代人的音乐观念，或者以民间音乐研究中形成的观念